

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

——跨国主义视角的分析

吴前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透过移民概念的理解,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移民的“行为-关系”特征、变迁,以及有关本土性与全球化互动之于当代移民及其民族国家的意义。文章认为,当代移民在不断的跨国实践中形成了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其民族性和本土性在与外部社会文化的交汇中得到了内容上的更新与扩充。与此同时,海外移民及移民社会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促动下积极参与祖(籍)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和经济建设,构成了一种跨国的社会力量。在这一进程中,民族国家,无论是移民接受国还是输出国,都采取了更加宽容和积极的姿态。

[关键词]跨国主义 当代移民 本土性 全球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加速,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移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包括家庭团聚、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劳工移民、投资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等)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开始用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问题,其基本观点是:跨边界人口流动是“移民形成与维系的、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多重社会关系的进程”;当代移民建立了跨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social fields);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因此体现了“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①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探讨全球化时代移民的“行为-关系”特征、变迁、以及有关本土性与全球化互动之于当代移民及其民族国家的意义。

一、当代移民概念及其特征

关于移民概念,比较一致的社会学解释是:个人或群体跨越象征性的或政治性的边界,进入到新的居住区域和政治共同体的永久迁移运动。^②它指国际移民,不涵盖从乡村到城市的一国内部人口迁移,也有别于难民,属于一种跨越边界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和运动。当代移民的发生和演进与当今时代迅

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改变了传统的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接受和鼓励移民(特别是家庭团聚、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此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往发达国家的移民逐步增多。1975 年以来,全球移民数成倍增长。目前 60% 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几乎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移民。由此形成的跨国移民被学术界称作“种族离散者”(ethnic diaspora),并成为描述当今任何移居在移民接受国、并拥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种族群体的特定概念。

全球化时代的“离散者”概念,其包含的内容除了永久性的跨界迁移之外,更是一种移民认同的多元化状态和世界主义倾向。这与过去强调移民坚持单一认同,如在移入地坚持侨居者的身份,刻意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等等大不一样。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已不仅仅是涉及移民在居住地的政治行为、文化情感和社会基础

^① See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 9;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pp. 217-237.

^② Gordon Marshall ed.,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98, p. 415.

等方面,而且也涉及到怎样重新确定移民概念的问题,即当代移民和以前移民有什么不同,以及这些移民和现存的民族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故而,从跨国主义角度研究移民的本土性和全球化关系问题,既是要观察移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经历和变迁,也是要思考民族国家如何面对跨国移民共同体,并采取何种相应的政策措施。尽管在今天,“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政治限制,阻碍各族人民广泛自由流动而成为移民的敌人,但一个重要现象是,凡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中心,也必然是移民散居者的集聚中心”。^①

从跨国主义角度理解当代移民,可以看出其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族群联系的跨国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结合。全球化时代,移民群体的跨国性特征体现在一系列有关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行为—关系的互动方面,即他们虽然处地分散,但在精神上呈现出特有的凝聚性。这种凝聚通过移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得以实现。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指的是,人们尽可能地建立最广泛且可适用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节点”连接起其他人,构成网络。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的是在网络或广泛的社会结构中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掌握稀有资源的能力,以及个人在需要时动员和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它来自于个人关系的网页。^②移民问题的跨国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于移民个人和群体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安顿初到异地的移民,起到了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依靠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群体和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本土性内容的空间表达形式。如今,这种在异域所表现出来的基于本土性的社会文化内容,经过全球化的启蒙,成为一种跨国式的族群互动,并进而形成了移民“跨国的社会空间”,连接起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人群,它“冲击着民族国家的架构,但民族认同没有式微,反而促成同一民族在全球范围内组成跨国社会的原动力,如信奉回教的民族所组成的跨国民族社会空间得到了宗教组织的支持,而跨国华人的社会空间则常获得两岸政府的支持”^③。与此类似,世界性的海外移民社团也在通过社会网络的分

布,规模愈趋增大,其调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愈益增强。这些迹象显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功效在于通过不同的地域和相似的文化连接跨国而居的人们,进而形成移民个人和群体与祖(籍)国相互依赖和彼此支撑的格局。

第二,身份意识的离散性: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的确立。跨国移民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身份意识的离散性,一方面,他们“无以为家”,是散居者和漂泊者,尽管拥有基本的族群价值观和身份意识,但缺少精神的根源感;另一方面,他们“处处为家”,属于世界主义新身份的一群^④,时时与这个世界的新近发展取得协调,保持同步。如果说当代对于移民散居者的概念,更多地与全球化概念相联系,虽有民族国家的根,却没有民族国家的意识或者具有多重民族国家意识的话,那么移民输出国和接受国以及移民本身的行为表现和精神实质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应的选择与认同:在移民输出国方面,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摩洛哥和土耳其等正在使本国的海外移民更容易保持他们的国籍,以便在这些移民社群中有效地促进国家利益,争取投资和汇款;在移民接受国方面,许多国家,如瑞士、荷兰等已经允许双重国籍,以便利外来移民自然归化和主动融入居住地。^⑤至于移民本身,不断的跨国实践和行为联系,非但没有消弭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反倒促成他们具有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并在此框架内维护和推进双边的国家利益。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移民社会的精英阶层中,该群体在成为居住国的中产阶级和模范移民脱颖而出之后,他们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穿线搭桥,为两国的文化交流、科技进步、经贸往来和外交关系打通方方面面的渠道,从而把本土资源和全球进程连接起来,推进和加强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互惠与互动。迄今,这种致力于本土性与全球化积极融合的例子已成为当代移民的佳话和海外移民成功的范例。许多精英移民把这种成就

① 王康武:“移民及其敌人”,《王康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82页。

②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 Social Formations: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ferti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uly 1, 2001, Princeton University, WPTC-01-16.

③ 孙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认同与文明冲突”,《思与言》,2000年3月期。

④ 陈国贵:“失根、寻根、重根——反思海外华人世界主义新身份”,《马来》《星洲日报》,1999年10月14日。

⑤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 Social Formations: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fertilization”.

视作反馈家邦、造福人类的己任,他们属于具有多重民族国家意识的一群,代表着全球化时代移民社会发展的根本大势。

第三,母国认同的根连性:回归运动和文化保持的内外并举。全球化进程在弱化民族国家职能的同时,也加强了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即所谓母国认同的根连性,它通过民族认同和文化精神得以凸显。这种根连性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移民在取得居住国永久居留权之后或干脆放弃居留权,回到祖国,致力于促进投资、贸易的经济活动和科技与文化的创新与建设工作。当然,他们在把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带回本土的时候,有一个对本土性和全球化进行再嫁接和再扬弃的过程。在中国,这一批回归者被称作“海归派”,指的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赴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深造后学成归来的海外人士。目前,这一指称已被视作海外归来群体的集体符号与社会象征。他们带动和影响目前尚在居住国欲走还留、举棋不定的海外移民的态度和行为。第二种情形是,除了直接参与祖国回归运动之外,更有大部分移民在海外保持与祖(籍)国之间的经常性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回应祖国政治、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活动得以维持和拓展。至于更经常性的联系则发生和保持在当地的移民族群中,他们通过社团活动、宗教仪式、文娱节目等形式,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嫁接工作,以促进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了解。这种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致力于维护本土文化的根源性努力,体现了海外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其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既反应在回归移民的行为、关系架构中,也呈现在域外移民的身体力行中。海外移民与母国认同的根连性显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

综上所述,当代移民及移民社会的特征在于他们是跨国的、离散的,同时又是凝聚的、团结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民族性、本土性的资源才是丰富的、顽强的,他们的全球化努力既是散漫的又是务实的,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有各自的表现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既规定或影响着移民方向与进程,同时也在实践着自身发展的使命。

二、移民的本土性及其 与外部社会的关系

在移民研究理论中,“推拉”效应属于传统的研

究方法之一,它强调移民如何因为财富的吸引、生活环境的合适和个人的发展需要而决定跨国迁移。在“推”的方面,有移民输出国本身经济落后、生活贫困、高失业等因素;在“拉”的方面,有移民接受国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劳动力短缺、需要外来移民等因素。这一系列“推”与“拉”因素的结合,鼓励移民去承担风险和争取最大收益。当然,在居住国内,移民们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由此形成的移民社会,一方面在居住地维系着与祖(籍)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保持或改变着旧有认同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与居住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成碰撞,他们中的一部分融入到当地社会,另一部分则渐渐自成一体,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和隔离的状态。^① 移民及移民社会由于不同的教育背景、经济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移民的本土性”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地方意识与族群认同,它透过语言、心理、宗教、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等内在规定性表现为一种共同的地域特征和集体身份。以此观之,当今散布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在参与居住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本土性怎样构成和丰富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这些本土性又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得到重新梳理和扩容,这些本土性的内容又怎样阻碍他们的进一步融入,从而促成其中的一部分人致力于全球化的努力和行动,等等,这些问题在当代移民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探讨价值。

移民群体的本土性在与外部社会发生碰撞的时候,主要产生三种形式的演化。第一,移民在全球化的大舞台上展现本土性的内容和价值,实现文化交汇。一般来说,本土的文化与价值,是我们习惯的内容,它根植于内心,耳熟能详。就进入移居地的移民而言,这些本土的内容,包括从生活习性到价值观念,无所不在。因而当面临全球化压力的时候,移民们对它的态度是接受的还是批判的,就牵涉到一个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如何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问

^① 以美国的朝鲜人而言,他们大部分聚居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等大城市。仅洛杉矶就有 65 万余朝鲜人,其中大部分聚居在奥林匹克大道一带,形成类似唐人街的 KOREAN TOWN。在这里,朝鲜文招牌的商店随处可见,泡菜、冷面等朝鲜料理一应俱全。朝鲜人即使一句英语不懂,也不会感到任何生活上的不便。参见:“从亚马逊到撒哈拉:全球朝鲜人”,《华夏人文地理》,2003 年 8 月 24 日。http://trendsmag.sina.com.cn

题,即怎样从本土内涵出发去观照世界,以实现与其他种族和民族平等对话与交流的目的。许多人相信,“本土性”是人类“文明朝向世界化、全球化”历史轨迹中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所以有必要从自身文化的个性与需求去寻找世界化,达到相互理解、接纳和欣赏的目的。以新加坡华人社会为例,一些学者特别自信他们中英夹杂的双语能力,认为这正是新加坡华人的本土性在全球化包裹下得到张扬的证明:一方面,本土的、传统的语言价值没有丢失,它通过政府推导和邻国中国的经济强势而得到推动;另一方面,全球化理念仍然主导着新加坡华人社会,令他们发展出自豪的双语能力。同样成功的例子是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徐忠雄(Shawn Wong)、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赵健秀(Frank Chin)等人,他们在以英文为主要载体的作品中,大量运用斜体拼音式华文、中国俗语或俚语的杂质英语,以明示其使用语言的主导权和融汇华、英双语的能力。美籍华裔作家的创作说明,族裔属性能够在强势的语言环境下诞生出本民族的文化特色,^①本土性的内容可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诞生出新的文化衍生物。又如,世界各地的民族聚居区,如唐人街、意大利城和韩国街等等,一直以来被视作母国文化在海外的“飞地”和对移入社会的抗拒。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发现这些民族聚居区已经脱离了原来文化意蕴上的孤立,逐步构成了居住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凸现出旅游与文化的资源与价值,成为全球化背景中保留和延续本土性的具象,并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由此可见,本土性的内容和价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了多样性,也获得了表现的舞台和存在的意义。这种文化交汇的例子,反映了本土性借助于全球化而得以展现的现实姿态和积极趋势。

第二,移民在面临全球化压力时,及时整合文化资源,实现自身力量的扩容。20世纪末期,当全球化浪潮逼近的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种族群体并非如同化论者所预想的那样逐渐消弭于主流社会中。相反,它在数量和规模上更壮大了——通过社会网络的空间分布和社会资本的功能运用,各移民群体不断整合自身的文化资源,以抵御可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社会动荡。以海外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为例,人们注意到,冷战后海内外学者有一种倾

向,即把过去严格区分辨认的华侨、华人和华族,^②冠之以“华人”涵盖之。其较具代表性者,当推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在他眼里,凡种族和文化上同属于中国但国籍不同的人群就为“华人”。他认为,“华人”的含义在于具有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背景,而不能以地理政治为边界划分,因此,一个借助文化根源并以全世界为背景的跨国界网络,成为了冷战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超越政治疆域和地理界限,扩大文化网络的共有心愿。^③之后,新加坡学者刘宏提出了“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海外华人群体的研究,已经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地理疆界,一种新的动态性的思考正在促使人们把海外华人的经历和经验放在全球化的背景视野中,并与之互为连接和彼此共享。^④也就是说,以中国血统人为背景的同文同种的“华人”意义就此凸现,民族的“复合化”^⑤概念得到呼应与落实——超越血缘联系、传统宗教、地域文化等相对自然的族群纽带而形成的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命运并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的群体得以架构和形成。由此,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在20世纪末期开始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以及有关“华人”的概念,^⑥包括海外的华裔精英、知识分子和所有认同中国文化的人,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和随时体现出来的与中国人有关的作为华人的民族意识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

① [新]吴英成:“开放中国属性:海外华人圈华语变体切片”,中国福建举办“华人地区语文生活与语文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② 华侨、华人和华族的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华侨”指那些出生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尔后又移居国外的人,他们拥有中国国籍,其心理特征以“中国取向”为主。“华人”的概念不似“华侨”那般明确,它通常可以被用作指代不同的含义:(1)指已入籍居住国的中国血统人,以与“华侨”概念相区别,突出政治法律身份的当地化;(2)泛指已入籍或未入籍的所有居住海外的中国血统人,着重其入种学上的意义;(3)指已入籍居住国,但在心理情感和文化价值方面较多地倾向于中国的海外中国血统人,所谓“政治上认同当地,文化上认同中国”,心理特征处于“中国取向”和“当地取向”的过渡之中或兼具有“双重取向”者。除上述三者有关“华人”的指称之外,尚有“华裔”的概念,主要指出生于居住国,拥有居住国国籍的第二、第三……代移民,包括一些拥有中国和居住国双重国籍者和无国籍者,他们主要讲当地语言。由于“华裔”通常被包含在更宽泛的“华人”概念之下,因而“华人”的含义又可扩展为上述四种。因此,既明确又含糊的“华人”一词因指代者用意不同、场景有别而运用得特别广泛。至于“华族”,则指那些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地认同当地、同化于当地的中国血统人,其心理特征也以全方位地认同当地为主。参见吴前进:《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③ 杜维明:《一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④ 刘宏:“跨国华人:实证分析与理论思考”,[香港]《21世纪》,2002年6月号。

⑤ 庞中英:“族群、种族与民族”,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情感关怀,表达了新一代“华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自觉地回顾和亲近故国母土的自然之心。这也表明,在全球化挑战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际,重新认识民族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华人的种族特征,无疑有助于华人移民与中国—世界关系的互动、理解和沟通。由此显示,一个由华人移民族群所形成的跨国、跨区域的社会文化网络正在悄悄酝酿成熟,它在依循和突破民族国家架构的同时,又在反馈和增进着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存、共荣。可以深信,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移民与中国及其居住国的关系将愈趋紧密,他们会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外交推动、国家统一等一系列事件中参与和分担其作为世界公民的职责。因此,海外华人的本土性,尽管随着各国政府的同化与融合政策的成功,以及第二、三乃至第四、五代的成长和认同居住国而式微,但却不会全面消失。事实上,移居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承袭了由祖籍地带去的传统文化,并在回应时代的变化和调整与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切合方面,发展出多种变异现象,兼具不同的面目。如今,“华人”称谓的广涵性本身便代表了本土性传承与变异的自然结果,它与全球化的要求和进程相适应,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本土性的更新和扩容。

第三,移民在遭遇居住国社会敌意时,本土性内容成为融入障碍和保护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移民的本土性和全球化关系问题,事关如何协调地方认同和全球意识、族群身份和世界主义的问题。移民群体由于教育背景、经济条件、宗教信仰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与移居地社会的外部环境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形下,外部社会是敌意还是友善、排斥抑或兼容,对于移民群体的适应和认同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外部因素的作用一般来说要大于移民群体自身的因素,并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移民与外部社会的互动类型以及移民社会本身的生存状态。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一个高度结合了本土性资源与全球化优势的国家,并且对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①在美国,移民既可以在政治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公民归属,又可以在民族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既可以与主流社会亦步亦趋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又可以在那里找到类似家园的感觉,在母体之外参与“想象的共同

体”和祖国回归运动。当然,在大多数移居国中,移民的本土性内容与全球化意识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冲突的一面。历来,移居地社会对于移民作用的评价尺度有二:一是移民有没有给移居地社会带来好处;二是移民是否对当地文化认同形成威胁。据此,移居地社会通过比较不同世代的移民或/和不同祖(籍)国的移民,来判断哪一个移民社群对主流社会贡献更大,或更融入主流文化。当然,一旦文化威胁成为议题时,移民的各种贡献可能面临重新诠释,或遭至贬抑或视作危害。^②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中,移民的文化保持、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通常会被视作是对主流文化和同质化的抵抗,特别是当移民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差异成为种族分界标志时,主流群体便有可能把移民文化当作原始的、静态的和回归的标志,并把移民的种族共同体视作是一种对主流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威胁。^③因而,当移民在居住国面临社会孤立、社会不公、身份意识、文化冲突等问题时,其所涉及的领域既是地方的、国家的,也是区域的、全球的。而对于移民种族群体来说,在敌意的环境中,移民文化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为移民的身份来源和抵抗排斥与歧视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援。同时,移民文化的动力有时能够把族群的历史传统与移民过程的真实情形联系起来,以便移民能够在新的环境中根据经验和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创造和再实践,从而客观上为居住国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状态提供更多选择,主观上为抵御外部社会的敌意提供文化和心理的保护机制。

显然,当代移民的本土性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行为地方化,身份多元化,思想全球化。它由此也证明着,在当今“移民的时代”,一个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只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原则已经遇到挑战,一个新的全球公民模式会打破归属关系与地域性之间的阻隔。^④人们需要的不仅是作为民族一员的公民身份权利,而且也是作为人的权利——维

① 杜维明:“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杜维明文集》。http://www.confuchina.com

② 石之瑜:“论台湾政治的移民性质”,《香港》[21世纪],2001年12月号。

③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Third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p.39.

④ [澳]斯蒂芬·卡斯尔斯:“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护和尊重文化个性的权利,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这种模式将承认民族多样性,承认多重认同在当今社会的普遍性与合理性,而移民散居者已率先为这种理想模式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和选择的途径。

三、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本土回归运动

“全球化”的含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的“全球化”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广义的“全球化”指在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影响、合作日趋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并推广成为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从移民研究的角度看,全球化不仅呈现为一种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跨边界人口迁移现象和运动,而且也表现为由于世界市场的力量、科技的发达、通讯的发展、往来的便利和相互影响的频繁,移民迅速接受西方社会主导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潮、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从而形成与此相一致的共识和规范。在此背景下,移民的全球化意义通过参与祖国回归运动而得以落实。

在移民研究理论中,“本土回归运动”指的是接受了西方社会价值理念的一部分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祖籍地施加影响,以推进祖籍地的发展和改进。确切地说,海外移民致力于全球化的姿态和投身于本土回归的趋向,反应了他们调适本土性和全球化关系的愿望和选择。而本土回归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移民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和主要成果,它为移民本土性和全球化的重新契合找到了方位。

移民本土回归运动显示了全球化时代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立场的经久不衰。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祖国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其政治团体在促进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他的号召下,大多数海外散居者参与了这场回归运动,并共同创立了中华民国。至今,这种参与祖国政治的“本土回归”运动在散居者中更为常见,“祖国政治”正以多种方式吸引着离散者和跨国共同体成员的关心、过问和参与。这种离散者、祖国政治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跨国政治活动和全方位联系正在许多方面创造出“去边界化的”民族国家。人员流动、通讯技术、电影

电视和人造卫星电视与因特网的高度发达均为跨地区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或不满抗争提供了丰富的表达方式。通过电子媒体,祖国政治、社会和文化把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联系了起来,使移民社区能够在居住地发出远程关怀。如2000年12月,在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当选之际,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社团组织当地移民观看总统就职典礼电视,并代表海外墨西哥人致贺信,表达他们对于新任总统的支持和对于墨西哥的民族感情。此外,墨西哥人社团更经常保持与墨西哥驻外使馆的联络,以促进他们国内亲属的权益。这些移民虽然身处国家领土边界之外,却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内参与、关心和过问着与祖(籍)国有关的一切活动。^①因此,移民的社会空间,伴随着法律、政治、文化衍生的多样化,不仅仅是实践和意义的多样化,而且也是地点的多样化。由此可以认为,跨国主义改变着人们之间的行为和关系,空间被创造成“社会场”,它连接和安置了那些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参与者。故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分离困境(诸如领土、集体、社会行动),人们产生出了一种新的“跨地方”(translocalities)的虚拟邻里关系的愿望:“地方”作为一种感知结构、生命特性和居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由电子媒体的压力而促成。可以预料,全球化时代,祖国政治对于离散者的意义正在变得具体、切实,而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关怀,及其连动效应和辐射能力已凝聚起散居者的政治表达,并形成了跨国的社会压力和社会关怀,成为全球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政府对于移民回归的积极姿态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在移民“本土回归”的政治参与之外,其他类型的“本土回归”运动,特别是经济类型的参与活动,也透过移民网络的构建得以展开和实现。在这一进程中,移民输出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看到了移民对于本土政治、经济^②和

^① David Fitzgerald, "Rethinking the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Cross - Border Politics and Hometown Politics in an Immigrant Un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58, August 2002.

^② 跨国移民社会的经济影响表现在移民们寄回国内家庭和社区的汇款方面。据估计,目前全球移民汇款的数额每年超过600亿美元,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所赖以寻求的资源。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 Social Formations: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 - Fertilization".

社会发展的意义,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拓展这种全球化的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鼓励和吸引他们的海外“公民”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因此,经济意义上的移民本土回归运动实际是一种移民群体和祖(籍)国政府的双向选择和共同意愿。

如果说移民的跨国活动通常由个人和私人机构实施的话,那么许多人注意到中国的相关活动则是由政府展开和促成的。中国政府认为,在多数出国者暂时无法回国的情况下,与其等待他们的回归,倒不如运用他们的专业技术为国家发展服务。政府与海外移民的联系可以通过因特网和空中旅行实现。尽管这些联系是零星的和有限的,但离散者网络却是一个现实,它通过海外移民的知识和技术来连接,并使移民自身深嵌于这一专业和社会网络的架构之中。同样,在东南亚,泰国政府鉴于约有 8% 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在美国的现实而发动了一项智力回流工程。泰国政府并不强求海外永久居民回归,但渴求有经验的海外泰国高技术人员参与本国的代表项目和核心工程。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必须运用 10 万海外新加坡人的资源,以推动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为回应,海外新加坡人建立了一个新加坡人散居者网络(SingDiaspora.net),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① 在南亚,印度政府看到 2000 万海外印度人的潜在力量,^② 以及他们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影响力,改变了传统的“不理睬”政策,开始向海外移民做出积极姿态。2003 年 1 月 9 日,印度政府在新德里举行三天会议,用红地毯的高规格迎接海外成功的印度人,来自 63 个国家的 2000 名印度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和企业大亨,这是印度建国 55 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外印度人盛会,也是政府吸引海外侨民参与经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印度政府认为,海外侨民不仅为国家带回了资金和技术,而且也构成了印度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印度甚至考虑通过立法,允许居住在海外的印度裔人拥有双重国籍,^③ 并设立海外印度人日。目前,每年有 10 万印度人,特别是 IT 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前往美国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后,即使不选择回国,也仍保持着与原籍国的经常性联系,并在美国和亚洲之间促成了一种“智力流通”。^④ “智力流通”意味着亚

洲经济并不会因为技术、经验和智力的流失而干枯,海外移民的本土回归运动为本土资源与全球资源的互补与共享找到了契合之处。

总起来看,随着移民跨国活动趋势的加强,一方面,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应和了其参与祖国政治的愿望,这种跨越时空的政治“想象共同体”符合移民们的政治表达需求,同时它也为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提供了广泛解释的可能;另一方面,移民的跨国经济活动既是当代移民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海外移民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期盼。正由于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从民间到政府都在有意识地规划和构建移民网络,促进移民回归运动,以加强本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参与世界一体化进程。因而,无论是移民的政治回归运动还是经济回归运动,其跨国实践的趋势和意义,无可估量。

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种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从跨国主义角度分析它们之间互动,无疑,本土性是内在的、本原的,全球化是外在的、强加的,两者在交汇过程中,把移民的本土性资源和全球化努力结合了起来,进而反馈到移民输出国和接受国双方,从而有利于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跨国主义因此也被视作是对同化主义理论(即要求有色人种同化于居住国并与原籍地切断联系)的矫正。事实上,跨国主义把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联系了起来。^⑤ 而移民“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的心态、处境和行为,构成了他们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促成有意义的互动与联系,这种互动以本土性为基础,以全球化为归依,丰富和发展了多种文明,实现了人类价值体系的共享与共荣。○

(责任编辑:张浩)

^① Andy Ho, “Diaspora Network can Offset Brain Drain”, [新]《海峡时报》,2002 年 4 月 25 日。

^② 海外印度人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中国移民,其所结合的资本收益据称有 160 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内 GDP 的 35%。See Amol Sharma, “Come Home, We Need You”,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3, 2003. <http://www.feer.com>

^③ 这些可以拥有双重国籍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④ 如今,在美国硅谷成功的印度企业家正在回国投资,慷慨地捐资他们的祖(籍)国。一些海外印度人在班加罗尔(印度中南部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建立起了软件工业园区,以与硅谷的印度软件业相匹配。此外,还有一些慈善事业,如居住在美国的孟买印度科技学院的校友给母校捐助了 220 万美元。Amol Sharma, “Come Home, We Need You”,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23, 2003. <http://www.feer.com>

^⑤ David Fitzgerald, “Locating the National and Local in ‘Transnationalism’”, Presented at the UCLA Second Annu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Race “Ethnicity, and Immigration”, May 28, 2002.